



中国学术档案大系

主编 陈文新

中国文学批评史 学术档案

陈水云 主编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中国学术档案大系

主编 陈文新

本书为武汉大学自主科研项目（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得到“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中国文学批评史 学术档案

陈永云 主编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学批评史学术档案/陈水云主编.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2. 11

中国学术档案大系/陈文新主编

ISBN 978-7-307-09781-0

I. 中… II. 陈… III. 文学批评史—中国—汉、英 IV. I206.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89176 号

责任编辑:李 琼 江俊伟 责任校对:黄添生 版式设计:马 佳

出版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cbs22@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 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20 × 1000 1/16 印张: 39.25 字数: 583 千字 插页: 2

版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7-09781-0/I · 563 定价: 82.00 元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凡购我社的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思想与方法：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现代品格

（代 绪 论）

站在新世纪的地平线上，审视 20 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史这一学科的发展历程，我们认为有以下三个重要发现不可不提：一、20 世纪末提出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这一命题，是对肇始于 20 世纪初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创建和发展的现代化转型这一历史进程的回应与反思。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创建与发展脉络，实质上与古代文论研究的现代转型进程如影随形。二、学科研究的现代化转型进程，以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具备了现代品格为标志，“学术与思想”与“学术与方法”，可以作为考察这种现代品格的两个基本维度。三、对 20 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学术研究史进行研究，应本着“存往之真，启鉴将来”的目的，即对过去的学科史及学术史力求还原求真，对将来的学科发展起启示镜鉴之用。我们这本《中国文学批评史学术档案》虽然只能对学科史及学术史进行钩要式回顾，仅能提供学术思想系谱上的部分片断，但仍然可以与其他的同类型著作，共同达到“存往之真，启鉴将来”的目的。^①

① 为避免与“论著评述”、“论著提要”、“大事记”等各部分的相关内容重复，绪论的写作采取了一定程度的“损益”原则。“论著评述”部分所选 16 篇原文，因已附相关学者和文献的详细信息，鉴于其在学术史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绪论中除简要引述和评论之外，概不详加说明。“论著提要”和“大事记”部分，因行文简要，涉及重要的学术思想、重大理论问题时，在绪论中则给予一定的述评和阐释。关于本书的目的、原则和编撰体例等，请参见文末所作的简要说明。

一、学科发展史略

以 1927 年陈钟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出版为标志和起点，中国文学批评史这一学科已走过它的近九十年历程。在 20 世纪末期，“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提出，如石击水，惊波动澜。其流布学界之广，涉及问题之复杂，使它必然成为一个跨世纪的重要命题。我们认为，这一命题事实上肇始于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学科创建期。当“中国文学批评史”被以某种理论模式或较成系统的框架来书写时，“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就已经开始了。在学科发展过程中，这一转换进程始终没有停止过。用这一更为宏观的视野来检视学科的发生与发展，我们认为它大致经历了开创奠基期、沉潜分化期和反思拓展期。开创奠基期大体上确立了学科创建的基本原则、方法和基本理论构架；沉潜分化期，学科的现代化进程遭遇挫折，但在文献史料的整理与研究方面则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反思拓展期主要解决学科研究如何才能融入当代中国文论的总体建设并健康发展的课题。三个阶段都不可避免地受到现代社会中的主流意识形态、主要社会思潮及文化思潮的影响，呈现出鲜明的现代转型特点。

（一）开创奠基期：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

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创建是中国的传统学术研究面临种种现代化思潮的冲击、要求现代转型的必然结果。20 世纪初期的“整理国故”运动是孕育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温床，“科学方法”则是学科创建的根本方法。

“整理国故”是 1919 年（民国八年）5 月《新潮》杂志针对“国故”、“国粹”研究提出的主张，即胡适所谓“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新思潮的意义》）。从学术研究的角度上来说，“整理国故”是民族传统文化仍然具有顽强生命力的要求。它所体现的学术氛围，对学术研究的具体问题的考察（如史料的保存与挖掘），都是以传统文化为根基，坚守了学术研究的民族特色。在这种文化运动思潮的影响下，对中国古代丰富的文学批评及理论进行整理，也成为“整理国故”运动的重要构成部分。

“科学方法”是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创建的根本方法。胡适认为，“整理国故”就是“把三千年来支离破碎的古学，用科学方法作一番有系统的整理”。^① 胡适所谓的科学方法，是指“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但我们认为，在学科创建的过程中，学者们对科学方法的渴求，实质上已突破了胡适的认识，而更多地指向西方现代科学和学术研究的多种理论体系中的新思维和新方法。“整理国故”的主将们正是在借鉴西方现代学科研究的新思路、新方法的过程中，反思中国传统学术的文化精神、运思方式和研究方法，尝试创建新的学术研究体系，取得了奠基性的研究成就。

“整理国故”文化思潮的影响和“科学方法”的广泛运用，合力开启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学科创建工作。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末，以陈钟凡、郭绍虞、罗根泽、方孝岳、朱东润、傅庚生等为代表的第一代学者，都受到了“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这一文化思潮的影响。譬如陈钟凡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1927年）的《自序》中就明确说明了他出书的动机：“1921年8月至1924年11月，任东南大学国文系主任兼教授，对当时的学衡派盲目复古表示不满，乃编国文丛刊，主张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正是中国文学批评史这一学科开创期的突出特点，它具有与传统学术研究迥然不同的现代化特质，这说明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现代转型从此时就已经开始了。

在“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学术语境中，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结合西方的“文学观念”，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进程划分为演进、复古、完成三个阶段，并围绕文学观念上的“复古”与“新变”思潮，对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与理论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梳理。^② 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也是在考察西方的文学观念的

① 胡适著，唐德刚整理：《胡适口述自传》，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19页。

② 郭绍虞的学术研究基本情况参见本书第一部分。

基础上,在文学的“广义”、“狭义”、“折中义”之中选择了“折中义”。^①其《周秦两汉文学批评史》中的长篇《绪论》,明确指出文学批评的目的是“固在了解批评者的批评,而尤在获得批评的原理”。这本著作充满学科建设的自觉意识,在理论上明显有受到西学影响的痕迹。方孝岳的《中国文学批评》重视“横推各家的义蕴”,对先秦至清代的重要文学批评和理论思想进行钩玄提要。朱东润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无论是宏观体例的建构,还是微观问题的讨论,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西方哲学美学和文学理论的影响。如他认为殷璠、高仲武、司空图是“为艺术而艺术”,元结、白居易、元稹是“为人生而艺术”等,就是用西方现代文艺理论来研究古代文学思想的尝试。傅庚生的研究旨趣特别明显地指向文学批评原理与理论问题,他的《中国文学批评通论》共分三编,上编绪论,共四章,论文学、文学批评之义界,论创作与批评的关系,对中国文学批评的历史进行简介,并提出“感情、想像、思想、形式四者,为构成文学之四要素”。^②中编本论,进一步从感情论、想象论、思想论、形式论四个方面展开。下编结论,以“个性时地与文学创作”、“文学之表里与真善美”、“中国文学之文质观”三章研究问题。全书鲜明的理论性和系统性,正是“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典型体现。

除上述这些述史型著作颇受“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影响外,该时期的一些主要研究专题和具体问题的精彩论著,同样具有这种特点。蔡正华的《中国文艺思潮》(1935年),许文雨编著的《文论讲疏》(1937年),朱维之的《中国文艺思潮史略》(1939年),钱锺书的《谈艺录》(1948年)等,都接受了西方哲学美学、现代社会思潮和各种学术思想的影响。

所以,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学者,在总体上尝试借鉴西方现代学科研究的新方法,以一种更为逻辑化,更加体系化,更具理论色彩的思维方式,来建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的学科体系。但同时,第一

① 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一书的基本情况详见本书“著作提要”部分。

② 傅庚生:《中国文学批评通论》,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8页。

代学者们并没有因为采用了“科学方法”而放弃自己的文化母体，他们尝试用新的观念和方法来研究传统文化，这就是所谓“昌明国粹，融化新知”。

（二）沉潜分化期：学术研究的两极分化

20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由于受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在现代化转型中遭遇一定的挫折，并且呈现出鲜明的两极分化趋势。

一个趋势是学术研究变成了政治运动的助推器和政治化文艺观念的传声筒。不少学者主动地接受思想“改造”，用政治标准取代文艺标准，苏联文艺理论模式更是全面控制了文艺理论界。在这种历史文化语境中，中国大陆的优秀理论著作难觅踪迹，仅有的一些著作也染上了浓厚的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的色彩。如黄海章在《中国文学批评简史》的《概说》中说：“清代盛行的桐城派，直到五四运动以前，在文坛还有相当的力量。他们专门讲求文章的神理，气味，格律，声色，内容非常空洞，脱不了形式主义的窠臼。然而五四运动，由于李大钊等同志的领导，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的输入，却把它摧毁得干干净净。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更如旭日东升，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已经被打垮了。到了现在，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照耀之下，走向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紧密结合的道路，吐露出无限的光芒。我们回顾过去，有不少优秀的文学理论，可以供我们吸收，来丰富我们现代文学的内容，同时也感到了在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导之下，要积极地发挥创造性，才能够在世界上开出奇异的鲜花。”^①这并不是一种冠冕堂皇的说辞，因为在全书中多见有此类的言语，由此可以看出学者甚至是很主动地跟随着政治的指挥棒来进行学术研究的。

郭绍虞在这段时期所体验到的个中滋味，大概代表了这个时期的学者们的学术心态。在笼罩全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理论思想”（其实那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理论思想，而是苏联模式影响下的文艺理论思想）的影响下，郭绍虞对1934年和

^① 黄海章：《中国文学批评简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5页。

1947年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和下册进行改写，于1955年出版一卷本《中国文学批评史》。之后又出版改写的《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册，由于用政治意识形态的立场和标准来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及理论，体现出明显的时代局限性，郭绍虞遂放弃了对该书下册的改写。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新出版1955年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在《再版前言》中，郭绍虞说：“我总想把这部旧著改得差强人意，使它多少有利于具有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建立，有利于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但是目标愈高，愈觉畏缩，未能如愿，直到今天，还只能把这部资料性的作品贡献在读者面前，这是非常抱歉和惭愧的。”郭先生的这种心态，不是个别，也不是偶然，而是反映了一个时期的学术研究状况，说明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在这段时期的确遭遇困境。

另一个趋势是学术研究出现“述而不作”的倾向。可能是浓厚的政治氛围迫使一部分学者发生了研究目标的转向，披沙拣金的文献整理成为此期研究的唯一亮点。其积极的结果是使基础性的史料之学得到了重要发展，一批古代文学理论史料的爬梳、整理和相继出版，为20世纪后期的学科发展提供了较为充足的研究资源。在这方面作出重要贡献的代表人物仍然是郭绍虞。早在20世纪30年代，郭绍虞就开始下工夫整理古代文学理论的文献资料。^①他的文献整理的工作重点主要放在“诗文评”方面，尤其是对古代诗话的整理，用功甚勤。除了1939年出版的《宋诗话辑佚》，这段时期相继推出了《沧浪诗话校释》（1961年）、《诗品集解 续诗品注》（1963年）、《杜甫戏为六绝句集解 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小笺》（1978年）、《宋诗话考》（1979年）。此外，郭绍虞先后主持选编了《中国历代文论选》一卷本、三卷本，1979年修补增订为四卷本，这是至今高校中国文学批评史课程采用频率极高的选本之一。

1958年至1979年期间，由郭绍虞与罗根泽牵头主编，人民文学

① 如《陶集考辨》（1936年12月《燕京学报》第20期），《宋诗话辑佚》（1939年《燕京学报》专号），《明代文人集团》（1948年《文艺复兴·中国文学研究》）专号。

出版社陆续出版了《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丛书》中的一部分，除郭绍虞自著的上述校注辑本之外，还包括各家或注释或点校考订的《文心雕龙注》、《饮冰室诗话》、《白雨斋词话》、《介存斋论词杂著 复堂词话 蒿庵论词》、《论文偶记 初月楼古文绪论 春觉斋论文》、《中国中古文学史 论文杂记》、《文则 文章精义》、《随园诗话：十六卷 补遗十卷》、《渚山堂词话词品》、《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蕙风词话 人间词话》、《昭昧詹言》、《四溟诗话 姜斋诗话》、《诗品注》、《六一诗话 白石诗说 溇南诗话》、《文章辨体序说 文体明辨序说》、《苕溪渔隐丛话》、《词源注 乐府指迷笺释》、《瓯北诗话》、《带经堂诗话》、《文镜秘府论》等。^① 此期在中国台湾也出版了一批关于诗话类文献的整理方面的书籍^②，惜两岸未通之前，大陆学者不易得见。

此期，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也先后出版各种诗话、词话、文话、赋话的校注本和标点本。有一些则是大规模的文献辑本，如唐圭璋主编的《词话丛编》^③，中国戏曲研究院编的《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④

此期大陆的述史型著作，在学科发展史上影响最大的是由刘大杰主编，复旦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编辑，1964年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该书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王运熙、顾易生接手出版中册和下册打下了基础。这本著作多次再版，影响及今。该时期的其他论著则乏善可陈。幸运的是，在台湾、香港和域外，则颇有一些佳构。^⑤

① 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丛书》，20世纪80年代以后仍然在陆续推出，已达十余种之多。

② 参见本书“论著提要”部分。

③ 唐圭璋主编的《词话丛编》1934年出版，收词话六十种，1986年由中华书局重新修订，增二十五种，共收词话八十五种。

④ 中国戏曲研究院编《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于1959年由戏剧出版社出版，1980年重印，全书共10册，收录了唐、宋、元、明、清五个朝代的戏曲论著48种。

⑤ 参见本书“论著提要”部分。

(三) 反思拓展期：“失语”与“重建”背景下的古代文论研究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以来，随着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的松动和思想界的逐步解放，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进入了反思拓展期。以王文生、徐中玉先后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年 12 月开始推出《古代文学理论研究》辑刊为起点（第 1~18 辑），至世纪之交，大量述史型著作（包括通史类和断代史类）和专题型论著应运而生。^①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学者们就发现中国现行的文艺学研究与学科建设并不能真正解决中国文学的实际问题。学界首先寻求在研究“方法”上突破，从而掀起 80 年代中期盛行的“方法论”思潮，以 1985 年 4 月出版的《文学研究新方法论》为代表。力求研究方法的革新，也影响到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但是其路径仍然主要是从西方借鉴。除了所谓“老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盛行之外，还有所谓“新三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也渐渐向古代文论研究渗透。强调研究的新方法，突破了社会科学领域，一些自然科学研究方法也被借鉴。研究方法的革新的确为学术研究带来了新面貌，但方法的滥用也会带来偏离文学理论研究本位的结果。其直接后果就是在“方法的迷信”中，中国文论变成了话语游戏，失去了它的本土适应性和现实针对性，这就是所谓“失语症”现象。90 年代中期，以曹顺庆为代表的学者们提出中国文论患上了“失语症”，并呼吁“重建”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的中国文论。^② 而中国文

① 述史型的通史类著作如敏泽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1981 年），复旦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编撰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册和下册（中册 1981 年，下册 1985 年出版），周勋初的《中国文学批评小史》（1981 年），蔡钟翔等人的《中国文学理论史》（1987 年），朱恩彬的《中国文学理论史概要》（1989 年），张少康、刘三富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1995 年），杨星映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纲要》（1996 年），王运熙、顾易生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七卷本（1996 年）。除通史类著作外，还有一批有影响的断代史著作，如叶易的《中国近代文艺思潮论稿》，罗宗强的《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和《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张毅的《宋代文学思想史》，许结的《汉代文学思想史》等。专题型著作则更多，参见本书“论著提要”部分。

② 相关论文参见本书选录的《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基本路径及其方法》一文的评述之“作者著述情况”部分。

学批评史的研究，也基本上是被置于“失语”和“重建”的背景之中进行反思和拓展的。

中国文论患上“失语症”的观点到目前为止仍然存在诸多争议，但是它的确形象地说明了中国文论在百年发展历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失语症”的提出，使大批文艺学学者，特别是那些以擅长西学著称的学者，开始思考如何从传统文化和文论中借鉴理论资源。在这种背景之下，学界将启动“重建中国文论”这一巨大工程的期许目光，投向了古代文学理论，“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这一命题也就被鲜明地提出来了。曹顺庆、李思屈的《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基本路径及其方法》一文，系统地提出了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基本步骤：其第一步就是对传统话语进行发掘整理，其次才是在对话中凸现与复苏传统话语，再次是在广取博收中重建话语体系，最后是要在批评实践中检验其有效性与可操作性。^①如果说“失语症”只是一种文论研究的症候，“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所承载的就是用来改善“失语症”症候的“期许之心”。

在学界取得一定共识的基础上，古代文论的价值被重估。对它的现代转换，以及如何转换，从观念到实践操作，都在世纪之交开始走向自觉。如曹顺庆、王超在《论中国古代文论的中国化道路：对“中国文学批评”学科史的反思》一文中提出：“五四”以来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基本上是在西方思维模式的影响下进行的，具体而言，主要经历了“学科化”、“体系化”、“范畴化”三条西化之路。要使中国古代文论从“失语症”中解脱出来，必须经过四个步骤：第一，承认中国文论较之西方诗学的异质性和话语独立性，避免“以西释中”或“以中注西”的倾向；第二，在“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这个命题中进入“古今对话”的现代阐释性理论视域；第三，在“古今融会”的同时进行“中西化合”，以中国文论的话语规则为本，融合或化用西方的理论资源，最终达到中西跨文明对话语境下的“中国化”研究。在承认中西方文论异质性因素的前提下，进行跨文

^① 曹顺庆，李思屈：《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基本路径及其方法》，载《文艺研究》1996年第2期，第12页。

明对话，中西文论思想的交流、互补和超越，最终达到“中西化合”的无垠之境。^① 这些建设性的意见，如何落实到操作层面，还需要更多的学者共同努力。

二、学术与思想

学术与思想的关系问题，是考察学科发展的进程是否具有现代品格的一个重要维度。从这一维度出发，又涉及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在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过程中，学者们是如何认识和处理学术与思想的关系的？二是在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中，学术研究受思想影响的情况是怎样的？

在学术研究中如何认识和处理学术与思想的关系？对此，首先应追溯到20世纪初期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它始于“中国文学批评史”创建的前夕。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可视为“学术”与“思想”的关系问题的发生语境。“问题”与“主义”之争本来是社会意识形态领域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之间的一次交锋，但却与学术研究有着潜移默化的关联。在学术界，“问题”指具体的学术性论题，而“主义”则可以理解为各种形态的思想。

在“问题”与“主义”的发生语境中，对“学术”与“思想”的关系问题有两种基本的观点，一是主张学术与思想分离。以学问家自命的学者认为，学术是学术，思想是思想，学术与思想并不是必然联系在一起的。中国的传统学术研究，如清代朴学，专注于训诂考据，受其影响，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中的文献搜集、整理与考据研究，是学术研究，但并不致力于阐释思想。这是从学理上来思考学术与思想的关系，为二者的分离寻求客观存在的依据。更多的学者是从主观意识上就排斥思想对学术的影响，认为由于思想的复杂性和主观性，它的介入会导致学术研究的纯粹性和客观性失效。我们认为，不论是从哪种角度出发，主张学术研究摆脱思想的影响并不现实。根本

① 曹顺庆，王超：《论中国古代文论的中国化道路：对“中国文学批评”学科史的反思》，载《中州学刊》2008年第2期。

的理由有二，其一是中国文学批评史这一学科研究的对象本身就是古代各种思想的载体，对批评和理论文本中包含的思想完全没有感觉是不太可能的。其二是因为任何一个学者，既不能完全脱离社会意识形态，也总是处于各种社会思潮交会的文化场域。在进行学术研究时，这些思想因素有可能构成他的研究“前见”或“期待”。所以，希望将学术与思想完全分开，是一种学术理想上的“乌托邦”。

另一种观点是主张学术与思想结合。郭绍虞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第一篇《总论》中就已经探讨了这一认识。他认为：“中国文学批评之演变蜕化，也自有其可以注意的地方。何以故？盖文学批评所由形成之主要的关系，不外两方面：一是文学的关系，即是对于文学之自觉，二是思想的关系，即是所以佐其批评的根据……由后者言，文学批评又常与学术思想发生相互联带的关系；因此中国的文学批评，即在陈陈相因的老生常谈中也足以看出其社会思想的背景。这固然不同欧西的文学批评一样，一时代有一时代所标榜的主义，而于各时代中似均可有明划的分；然亦不能谓中国文学批评全没有其思想上的根据。”^① 王元化先生的一个极有影响力的著名论断也是主张学术与思想结合。1994年7月，王元化在上海发表针对李泽厚所说的“学术家凸现，思想家淡出”提出：“学术和思想的关系，不是东风压倒西风，或西风压倒东风的关系，我们应该提倡有学术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学术。”1996年1月，《文史哲》发表了许纪霖对王元化的访谈，许纪霖问：“作为主编，您是以一种什么样的关怀或追求来主持这一文丛的？”王元化说：“我想，《学术集林》大概是颇不合时尚的读物。我们不想遵循目前流行起来的说法，把学术和思想截然分开。《学术集林》发表的文字，希望多一些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② 如果说“有学术的思想”是希望通过“学术”的研究来使思想具有科学性和有效性，以避免思想的盲目主观性的话，“有思想

①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1～2页。

② 王元化，许纪霖：《追求有思想的学术》（笔谈），载《文史哲》1996年第1期，第90页。

的学术”则是主张将思想渗透在学术研究中，以提升学术研究的理论品质。事实上，在研究文艺理论和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及理论时，王元化先生也正是在不断地反思自己的思想历程中，将学术与思想融为一体，达到了非常高的理论研究水平。

在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中，学术与思想相互影响的情况是怎样的？反思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学科发展进程，我们发现它不仅仅是一部20世纪的学术史，同时也是一部20世纪的思想史。一些主要的意识形态（尤其是政治思想），以及各种与学术可能产生关联的社会思潮中的观念、意识、立场、态度等，都或多或少地渗透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也正因为有种种思想的介入，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才会具有鲜明的现代品格。不过，我们要注意现代品格并非都是积极的、正面的，因为思想自身也存在正确的思想和不正确的思想。这种情况使得受思想影响的学术研究的情况异常复杂，我们在这里仅按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发展进程的主要脉络作一个简明勾勒。

在学科的创建奠基期，学者们大多以一种新的文学观念为基础，在历史绝对主义观念的影响下展开他们的“述史”研究。^①虽然学者们处于动荡不安、战火纷飞的时代，但是大体上来看，学者们的思想并没受到一个统一的意识形态的控制，于是能够致力于钩稽爬梳，考镜源流，从文学史自身的发生发展情况来研究批评史发生和发展的历史逻辑。还原文学史的真相，还原批评史的真相，在此基础上提炼出批评史发生发展的基本脉络，是这一时期学者的普遍诉求。这一时期的学者，在思想上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规范，但并不能说这些学者在进行学术研究时没有自己的思想。除了他们持有自己的文学观和文学批评观之外，他们也不能不受社会时代意识的影响。比如在1957年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一册《新版序》中，罗根泽先生反思了自己早期的研究情况，认为自己的研究也“不能完全摆脱当时的时代意识，也难以超越当时的时代意识。例如对‘载道’和‘缘情’

① 代表者有陈钟凡、郭绍虞、罗根泽、朱东润、方孝岳等。参见黄霖主编，黄念然著：《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文论卷》第十章的论述，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

的问题，我虽希望不沾沾于一种观念，但事实上仍接受了‘五四’时代认为文学是感情产物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至“拨乱反正”之前，意识形态影响下的“教条主义”和“路线斗争”话语，对批评史的理论研究产生了破坏性影响。在如何“述史”的历史观方面，黄念然先生将它归纳为实用主义的历史相对主义，个体的写作让位于时代的政治意识，时代政治意识对历史事实进行穿凿附会，以郭绍虞改写的《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册和黄海章的《中国文学批评简史》为代表。^①本书所选的罗根泽的《现实主义在中国古典文学及理论批评中的发生和发展》一文，也体现出这样的时代特征。我们认为，在意识形态的全面控制下，这一时期的文学批评史研究的“教条主义”倾向非常严重，尤其是社会政治斗争使得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深受“路线斗争”的话语影响。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理论研究在这一时期遭受严重挫折。但是学界大概觉得这一时期的理论研究乏善可陈，往往故意忽略或一笔带过。如今产生于这一时期的一些理论文本已经从学界的研究视野中渐渐淡化，部分文本极可能成为稀见本。由于学术史研究要求“存史明鉴”，我们认为对这些理论文本有必要作一个系统整理并进行再版，以力求保存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学术史真相。

新时期以来，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学研究的强力控制有所松动，国人的思想得到较大的解放。在各种思想的交锋中，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进一步深化，“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得到普遍认同。在此基础上，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述史”研究，主要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注重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联系和比较的方法来梳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和理论发展史，追求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在整体上对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学科研究进行了反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代表性的通史类著作有敏泽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复旦大学三卷本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蔡钟翔等人编撰的五卷本《中国文学理论史》、复旦大学七卷本《中国文学批评通史》

① 参见黄霖主编，黄念然著：《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文论卷》第十章的论述，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

等。断代史著作有罗宗强的《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和《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张毅的《宋代文学思想史》，许结的《汉代文学思想史》等。在这些著作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此期中国大陆学界的学术研究主要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相关原理来研究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和理论，仍然占据主导地位。

世纪之交，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世界以及中国，进入了亨廷顿所谓的“文明的冲突”的时期。在这种多元化的社会和文化语境中，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已经不可能只是固守传统思想，它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更多外来思想的冲击，这对于当下和未来的学术研究而言，有可能产生积极的影响，从而酝酿出一个百家争鸣的学术生态。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20 世纪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学术史，始终与各种思想相纠葛。没有哪个学者能够真正摆脱思想对学术的影响。

三、学术与方法

中国文学批评史学术研究的现代品格，也与学者们积极地探索并采用新的研究方法密切相关。尤其是当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及理论的研究不太容易寻求到新的思想资源的时候，研究方法的重要价值和意义更为明显。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文学批评史与中国文艺学在研究方法的采用方面的情况是一致的。学界经历了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方法年”（1985 年）的强力冲击，新的自然科学方法论与人文社会科学新方法纠葛在一起，产生了一些重要的文化讨论热点，比如 80 年代的“主体性”讨论，李泽厚的“积淀说”，刘再复的“人物性格二重组合论”，文艺界的“对人性的呼唤”等，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产生了影响。研究者们从各自不同的研究角度和研究领域，借用现代哲学方法、心理学方法、原型方法、语言学方法、人类学方法、符号学方法等，来研究文论和文学史现象，对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和理论进行多层次多维度的阐发。

研究方法的重大变革往往带来研究范式的转型。或者说，当某些